

道光《厦门志》中的闽南人文与城市记忆

何李, 陈林钰

(厦门理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 清代道光年间, 周凯主持编纂的《厦门志》是一部引证丰富、体例完备的地方志书。它较为详细地记录了厦门的历史沿革、典章制度、施政情况, 在本地艺文、风俗、城建等诸多方面体现出浓郁的地方特色。通过对道光《厦门志》的解读与探析, 提炼出其中所蕴含的闽南人文与城市记忆的元素, 能够较好地还原厦门的发展历程, 从而帮助读者更为深入地理解闽南地区的城市文化。

[关键词] 《厦门志》; 闽南人文; 城市记忆

[中图分类号] G 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9X (2023) 01-0084-09

厦门市地处福建省东南, 位于九龙江下方外侧的出海口, 俗称“下门”, 后雅化为“厦门”。秦汉之时, 厦门为荒蛮的百越之地。西晋太康三年(282), 置同安县, 辖泉州、厦门等地, 但当年即撤, 厦门复并入晋安县。后唐长兴四年(933), 再次归为同安县。宋朝时因为盛产“一茎数穗”的优质稻而得名“嘉禾屿”, 该地名一直沿用到元朝。厦门与泉州、漳州相邻, 扼守前往台湾的要道, 是大陆东南地区的门户, 其经济、军事地位随南方省份的繁荣而开始凸显。自北宋嘉祐三年(1058), 厦门岛上开始设防驻兵。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 岛上建城竣工, 被命名为“厦门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2)清军收复台湾岛, 并于次年设立台(湾)厦(门)兵备道, 厦门地名从此固定下来。

清代厦门经历了两次地方志的编修: 乾隆三十一年(1766), 薛起凤等人编撰了《鹭江志》, 此为厦门独立地方志的雏形; 道光十二年(1832), 由周凯总纂, 凌翰、陈荣瑞等参编, 撰写了《厦门志》, 即道光《厦门志》。需要注意的是, 清方志中厦门的地域概念主要指厦门本岛及其周边鼓浪屿、火烧屿、吴屿等面积较小的岛屿(参见图1), 应与目前厦门市下辖6区的行政区划相区别。

一、道光《厦门志》概述

(一) 周凯与道光《厦门志》的编纂

周凯(1779—1837), 字仲礼, 号芸皋, 又号捞虾斋, 别署内自讼斋, 浙江富阳人。清嘉庆十六年(1811)进士, 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道光十年(1830), 任福建兴泉永道^[1]。就任期间, 周凯对《鹭江志》的散佚深感遗憾, 又适逢重修《福建通志》, 于是“网罗散轶, 搜摭群言, 稽之《会典》, 征之案牒, 与士林诸君子相考订”^[2]。在其努力下, 《厦门志》于1832年编纂成书。

道光十三年(1833), 周凯调任台湾道, 后卒于任上。《厦门志》未能在周凯生前刊行, 仅留稿本存于吕世宜家。道光十九年(1839), 为完成周凯未竟之志, 兴泉永兵备道黎攀缪、福建水师提督陈化成捐款, 正式将道光《厦门志》刻印发行。该初印书板收藏于厦门玉屏书院, 民国间转存厦门图书馆, 后由厦门玉紫财产管委会进行了重印。1938年厦门沦陷期间, 厦门图书馆所藏原版书板被烧毁。幸有重印版的存世, 道光《厦门志》得以完整保留。

(二) 道光《厦门志》的体例与内容

道光《厦门志》是一部引证翔实、体例完

[收稿日期] 2021-11-22

[基金项目] 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FJ2019B06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YJC751005)

[作者简介] 何李(1982—), 女, 重庆市人, 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备的地方志书。它参考引用了大量文献, 包括《福建通志》《泉州府志》《康熙同安县志》等 102 部古籍及厦门岛各姓家谱, 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例如, 明朝遗民阮旻锡《夕阳寮存

稿》等文献就因道光《厦门志》的多处引用有所留存。全书共十六卷, 仿《会典则例》体例, 设图、略、表、传、记、志 6 门, 分隶各卷, 各门下又有不同细类 (见表 1)。



图 1 道光《厦门志》卷一所录厦门全图^{[2]15}

表 1 道光《厦门志》分卷内容简表

体例	卷次	内容
图 略	卷一《绘图》	厦门全图及御碑亭、万寿宫、紫阳书院等重要地点的绘图
	卷二《分域略》	总领其余各略, 主要陈述厦门的建制沿革与地理形貌
	卷三《兵制略》	介绍厦门的兵制沿革, 包括职官与兵额的裁设、将士俸禄、汛防安排等内容
	卷四《防海略》	介绍厦门的海防历史, 罗列汛口、汛地、炮台、墩台等要塞的位置分布
	卷五《船政略》	介绍厦门的船政历史, 包括战船定额的演变、船厂的发展过程、维修制度与费用标准等内容
	卷六《台运略》	简略记载赴台商船配送兵粮的定额与章程
	卷七《关赋略》	重点介绍厦门海关的设置与关税定额
	卷八《番市略》	简述与厦门通商的东南亚诸国的概况
	卷九《艺文略》	梳理从唐代至清道光年间涉及厦门的文人作品

续表 1

体例	卷次	内容
表	卷十《职官表》	康熙至道光时期厦门地区的职官名单
	卷十一《选举表》	北宋至道光时期厦门考取贡生及以上的士子名单
传	卷十二、十三《列传》	著录与厦门相关的知名人物事迹
	卷十四《列女传》	收录了明清两朝部分厦门女子贞烈贤孝的事迹
记	卷十五《风俗记》	从岁时节令、婚嫁丧葬、士农工商 3 个方面,描述闽南地区的习俗风尚
志	卷十六《旧事志》	包括“纪兵”与“丛谈”2 条细目;前者梳理南宋至嘉庆年间发生在厦门及周边区域的战事;后者为若干文人轶事的汇总

二、道光《厦门志》中的闽南人文

“人文”这一概念最早见于《易经》：“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3]。这里的“人文”，即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活动。刘登翰的《闽南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对闽南人文的类型、形态和内涵曾做出深刻的分析。他指出闽南文化的表现形态包括雅文化与俗文化 2 个方面：“雅文化主要来自于对中原儒学道统和文化精神的传承和发展；俗文化则是与闽南民众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各种文化形态和仪式。”“在讨论闽南俗文化时不应忘却雅文化的存在及其对俗文化的影响，俗文化中潜隐的雅文化精神内核。”^[4]道光《厦门志》的内容充分展示了闽南人文雅与俗的 2 个方面以及二者相互渗透和制约的关系。

（一）雅文化

闽南文化中的“雅”是对中原儒学道统与文化精神的接受和传播，这在道光《厦门志》的记载中主要体现为厦门地区文治教化的兴盛：一方面，地方政府重视教育，民间求学之风浓郁；另一方面，厦门文坛逐渐兴盛，时有优秀作品涌现。

1. 敬教劝学，尊奉朱子。唐代前期，厦门尚属于未开化的蛮夷之地；自中晚唐起，为推动广东福建等南部地区的发展，朝廷倡导儒学，鼓励科举，后各朝也皆延续此策。闽南地区受此影响，可谓是“缦胡之纓，化为青衿”，读书习文风气盛行，文人雅士渐出。例如，欧阳詹、苏颂

等皆为闽南士子中的优秀人物。南宋时期，朱熹任同安主簿。同安既是朱熹仕途的第一站，亦是其任职地方为官最久之地，同安因此被视为“朱子学”的发祥地。朱熹为政期间，敬教劝学，兴贤育才，极大地推动了厦门的文治教化。正如《鹭江志·嘉禾里序》所言：“自陈黯公避黄巢乱，徙厦金榜山，以文场老，宋朱子簿同邑，景仰高山，临履其地，镌诗于读书室以赞之，而嘉禾遂有先儒过化风。”^[5]

清康熙年间，厦门先后兴建了玉屏、紫阳两座书院，分别由兴泉永道和厦防同知负责。玉屏书院是厦门岛上历史最悠久的书院。据《厦门志·分略论》记载，它于康熙时期由威略将军吴英在城内原义学遗址上所建。户部郎中雅奇又增设学舍，建立集德堂，后因生徒稀少而荒废。乾隆年间，南澳总兵署水师提督倪鸿范、兴泉永道白瀛等人重建书院，通过考试优选生童，提供膏火费，并聘请名家授课。例如，进士郭迈、黄寿、蓝应元、郭龙光、郭尚先等人均曾执教于玉屏书院。紫阳书院得名于朱熹的别称“紫阳先生”，规模较玉屏书院小，为康熙时期厦防同知范廷谟创办。雍正时同知冯鉴加以扩建，后经同知李璋、胡宗文整顿，书院得以稳定发展，“文风大振，刻《鹭江课士录》，以示奖劝。自是相沿不改，延师讲学，遂无虚岁”^{[2]42}。两所书院尊奉朱子，设专祠供奉。玉屏书院的朱子祠，先设在“萃文亭”，后改在“集德堂”。紫阳书院祀奉朱子的场所为“紫阳祠”，位于讲堂之前。书院每年春秋两季进行祭祀朱子的仪式，以表达对朱子的尊崇。

地方官员的重视与倡导,为厦门营造了良好的治学氛围。在两大书院的引导下,岛上学风浓郁,市井乡都,诗书振响。除官办书院与社学外,各类私塾、蒙学馆也欣欣向荣,呈现出“塾学蒙馆,交错衢巷,书声相闻”的景象。

士人好结文社,月有课,课有期,期则团聚角艺,至宵分乃罢。求前辈甲乙之,又得玉屏、紫阳两书院以时鼓励。文气日上,虽市楼、估客,濡染耳目,亦有能拈诗斗韵者^{[2]514}。

在此情况下,厦门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学子。《厦门志·风俗记》“俗尚”一节里说“同安人物,厦、金尤为称盛。有明一代,廉节、文藻卓乎可观。厦门、漳、泉杂处,士子多秀异者”^{[2]511};又据《厦门志·选举表》记载,厦门在宋朝共有 5 人中进士;明代有进士 10 人,举人 18 人,贡生 25 人,此外,还有武进士 1 人,武举人 9 人;清代人数更多,有进士 12 人,举人 35 人,贡生 44 人,另有武进士 2 人,武举人 16 人,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见表 2)。

表 2 《厦门志·选举表》人物统计表			
	宋	明	清
进士	5	10	12
举人		18	35
贡生		25	44
武进士		1	2
武举人		9	16

厦门地区人才辈出,得到不少文士的称颂。例如,池显方《大同赋》用“地灵人杰,科甲云屯”^{[2]508}来形容厦门;清朝白瀛《玉屏书院碑记》认为厦门有孔孟遗风,“同安自紫阳朱子主邑簿,建高士轩、畏垒庵,倡导兴学,代有传人——俾海滨邹鲁之风,蔚然再睹”^{[2]508}等。

2. 文坛兴盛,佳作时出。《厦门志·列传》

提到:“厦门人物,以南陈北薛为最古。”^{[2]418}唐代文人陈黯与薛沙先后居于厦门岛上的金榜山与薛岭,时有“南陈北薛”之称,厦门文坛由是而兴。元代张翥在《金榜山诗》中赞其为“衣冠陈氏族,桃李薛公园”。南宋时期朱熹在同安的任职,更是对厦门文坛发展的一大推动。黄名香的《鹭江志》就认为厦门“唐为陈、薛衣冠之地,宋为文公过化之区”^{[2]508}。厦门文坛的发展情况在《厦门志·艺文略》里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

《艺文略》是对名宦邑贤关于厦门岛上风土人情、民命利弊之作的集中辑录。其小序提到:

厦虽蕞尔一岛,不乏名宦邑贤,故于奏议、公移,以至城池、公署、祠庙、岩洞之记、序、诗、章,有关岛上风化、民命利弊者,录为艺文略。他虽奇文雄策,不系岛上,概置不载^{[2]220}。

士人所作的文章,如内容与厦门岛相关,则收入《艺文略》中。具体又分为 3 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从唐代至道光年间文人士子关于厦门岛的作品书目(见表 3)。第二部分以文体分类,收录了疏、论、议、咨、书、记、序、墓志铭 8 类作品,共计 43 篇(见表 4)。其中既有注重实务的公文奏议,例如,杨捷的《水师请设等事疏》针对海寇侵扰的现象建议重设水师提督,万正色的《讨平逆巢疏》上奏其大败郑经部队将领朱天贵、夺取厦门一事;亦有书信杂记等文学性相对较强的个人创作,如倪冻的《醉仙岩记》、张对墀的《鹭门山行记》等。第三部分收录了朱熹、丁一中、池显方等知名文士的 105 首诗作。

表 3 道光《厦门志·艺文略》收录书目数量简表		
朝代	人数	册数
唐	2	4
宋	2	4
明	16	53
清	35	84

表 4 道光《厦门志·艺文略》各体作品数量简表									
文体	疏	咨	论	议	书	记	序	志铭	诗
篇数	4	1	1	1	6	15	13	2	105

由表3可以清楚看到厦门文坛从荒凉走向兴盛的过程。唐宋时期关乎厦门的作品十分有限,唐代书目仅列薛令之的《明月先生集》《补阙集》与陈黯的《裨正书》《颖川先生集》,宋代书目仅列林棐的《诗文集》与薛舜俞的《易抄诗书指》《文集》。到明代则增加到16人53部作品,清代为35人84部作品。这与闽南地区接受中原文化的进程是同步进行的。

《厦门志·艺文略》收录诗文作品148篇,以记录厦门风景名胜者居多,占总数的80%以上。例如,金榜山是厦门先贤陈黯的隐居之地,自宋始就有大量文人墨客慕名而来,留下了不少诗文作品。朱熹就曾寻访陈黯遗迹,作《金榜山诗》与《金榜山记》,后者现仍可见于金榜公园的摩崖石刻上。元代张翥的《金榜山诗》、明代池显方的《访陈希儒隐处》《登金榜山访唐陈希儒隐处》、清朝洪世泽的《金榜山访黯公石室》,均为游览金榜山、追思陈黯之作。其余本土景点,如云顶岩、五老山、普陀寺、鼓浪屿等,皆是文人们热衷书写的对象,当中不乏佳作。以同安人氏池显方的《玉狮斋记》为例:

榕本茂,不值花;地本高,不架楼;客本少,不掩户。海之胜,亭收之;山之胜,斋收之;云烟风月之胜,树收之;而合诸胜之胜,则主人收之^{[2]250}。

作者使用一组排比分句,营造出玉狮山树茂胜花、地高人稀的氛围;随后以“收”字将海与亭、山与斋、云烟风月与树等几组景致动态地连缀在一起,呈现出一种各景观互为补充、互为映衬的画面感。

又如清代张对墀的《鹭门山行记》:

时片云微黑,急雨骤至,点衣如风落松子。呼寺僧汲水煮茗,连吃卢同七碗,而山风已送雨过别墅矣。南普陀寺者,靖海将军建也。寺面海背山,众石磊磊可爱。左有石形似钟,旁产一石槌,横侧似欲撞钟状;右有石形似鼓,旁产二石槌,并悬似欲击鼓状^{[2]246}。

先写乌云骤雨之下,雨点打湿衣服有如松子被风吹落一般,极为有趣;而后“山风已送雨过别墅矣”的“送”字,将山风拟人化,不说雨停,而说风送雨过,别出心裁;再用比喻的修辞手法,生动地描写了南普陀寺周围众石状如石

槌、石钟、石鼓,且石槌欲撞钟击鼓之态。

道光时期闽县进士曾兆鳌在《玉屏书院课艺序》中评价说:“厦自薛珍君、陈希儒以文学崛起一隅,至宋而朱文公官其地,故土生其间多能文章而尚节义,盖遗风余韵至今犹有存者。”^[6]可谓对厦门文坛繁荣景象的真实写照。

(二) 俗文化

“闽南文化的特殊地域色彩和个性魅力,主要表现在俗文化之中。这也是我们谈及闽南文化,便离不开方言、宗族、民间信仰、民间戏曲和歌舞等等的原因”^[4]。俗文化指的是流行于民间的通俗文化,它体现在生活习俗、宗族血脉、民间艺术、民间信仰等日常民生层面,与大众息息相关。对此,《厦门志》有着较为丰富的记录,试举几例加以说明。

1. 岁时节俗。《厦门志·风俗记》里记录了厦门地区每年的节日习俗:从正月里焚香纸放爆竹、走亲访友,到七月中设盂兰盆会超度亡魂,再到除夕贴春联、祭祀先祖等。除了上述常见的风俗之外,部分岁时习俗则体现出典型的闽南特色。例如,正月“初九日,设香案,向户外祀之。爆竹之声达旦,名曰祭天”^{[2]509}。正月初九被视作玉皇大帝的生日,又称“天公生”,是闽南地区重要的节庆之一。当日,每家设香案向户外祭祀,燃放爆竹至黎明,以此祭天。又如,“初二日,街市乡村敛钱演戏,为各土地神祝寿,家造蛎房饭为供”^{[2]510}。每年二月初二,家家户户都会祭祀土地公,煮海蛎饭为贡品,还会集体筹钱请戏班表演,为土地神祝寿。重阳时,其余省份通常登高祈福,秋游赏菊,而厦门正处温暖多风之际,因此有登高放风筝之举。再如,每年腊月十六日,“商贾皆祭土神,牲醴极丰”^{[2]511},这一天是商户祭祀土地神、宴请亲朋好友的日子,又被称为“尾牙”。至今闽南及台湾地区的商家们还保留着“尾牙”酬宾的习俗。

2. 宗族血脉。古代律法在立嗣继承上有着严格的限制,只有男性无子时才允许立嗣。立嗣应按亲疏关系,由近及远选择同宗辈分相当之人,严禁立异姓为嗣,以防乱宗。然而,闽地风俗却与之大相径庭:无论是否有亲生儿子皆可抱养他人之子,且抱养对象不拘是否同宗同姓。

闽人多养子,即有子者,亦必抱养数子。长

则令其贩洋, 赚钱者, 则多置妻妾以羁縻之, 与亲子无异。分析产业, 虽胞侄不能争。亦不言其父母。既卖后, 即不相认^{[2]517}。

闽地特殊的养子制度, 多出于现实的考虑: (1) 避免亲子承担出海的风险。福建很多家族都以贩海为生, 风险极大, 稍有不慎便全船倾覆。善待养子, 既可以使其出海为家族谋利, 同时也保证了亲子的生命安全。(2) 为了壮大家族势力, 正如《同安县志·风俗志》所言“出于巨乡大族强房者为之, 嘉道前械斗盛行, 乡人恃丁多为强”^[7]。陈支平在《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中指出: 在相互割据、对抗的乡族社会里, 家族男丁的兴旺与否, 直接关系到家族势力的强弱^[8]。这种出于现实功利角度形成的抱养传统, 是闽台地区所特有的习俗, 直至民国时期仍然继续保留着。

3. 民间艺术。厦门地区在花艺、茶艺、曲艺等方面皆有独到之处。

因为常年阳光充足, 气温较高, 厦门气候较为适宜花卉生长。人们以花卉作为馈赠往来的必备品, 妇女们喜好以花卉为头饰, 鲜花的培育与编扎于是成了一门普遍的技艺。《厦门志》中有载: “生花尤工巧, 馈贻必用花。”^{[2]215} 培育的鲜花应当精致美丽, 以备应酬之用。此外, “岛中妇女, 编花为龙凤、雀蝶诸形, 插戴满头”^{[2]515}。女子们擅长将鲜花编织出各种造型, 佩戴于头发上, 不簪鲜花反而显得另类。清代周亮工的《闽小记》便将这些满头鲜花的妇人称之为“肉花盃”。

闽南人俗好饮茶, 盛行“工夫茶”之道, 厦门也不例外。工夫茶的茶具制作精良, 小壶称为“孟公壶”, 小杯则为“若深杯”。有客来时, 用火文煎茶以待客, 客人则应细辨其色香味, 然后小口品尝, 否则易遭人耻笑。好茶者还会进行斗茶, 从茶色、水痕、茶味等多方面比较烹煮茶叶的技艺, 一分高下。痴爱饮茶者甚至会出现“所入不足以供茶费”的情况。

在曲艺方面, 厦门民间流行梨园戏。梨园戏起源于福建泉州, 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剧种之一。角色分为7个行当, 又被称为“七子班”。

赛社演剧, 在所不禁; 取古人忠孝、节义之事, 俾观者知所兴感, 亦有裨于风教。闽中土

戏, 谓之“七子班”; 声调迥别^{[2]518}。

《厦门志》中所说的“闽中土戏”, 即梨园戏。戏曲使用闽南语演唱, 故“声调迥别”。《厦门志》里还提及一部极具代表性的梨园戏作品《荔镜传》(又名《陈三五娘》), 讲述的是泉州人陈三与潮州女子黄五娘的爱情故事, 深受当时女性观众的喜爱, “妇女观者如堵”。但因其歌颂的自由恋爱的方式有悖于传统的婚姻观念, 因此一再被官府禁演。时至今日, 《陈三五娘》仍是福建省梨园戏实验剧团的保留剧目之一。

4. 民间信仰。闽地笃信鬼神之说, 民间信仰盛行。祭祀的对象五花八门, 已逝的先贤名人, 乃至石头、大树、木偶、古柩等, 都可以成为祭祀的对象。例如, 农历六月十八日为翔安马巷池王爷诞辰, 传说池王爷为明代一池姓进士, 为免百姓受天花荼毒, 将痘毒吞下身亡, 百姓感念其恩德, 为之立祀祭拜。又如, 民间信奉风狮爷, 将石头雕刻成狮子状, 置于屋顶或村落高台等处, 用来镇风止煞, 祈求家宅平安。闽地祭祀名目繁多, 终年不绝, 民众迷信巫觋, 且重神不重医, 常将病痛归为触犯鬼物而讳疾忌医。上述这些行为, 一直被秉持儒家正统思想的士人所诟病。清代《重纂福建通志》里指出: “闽人好鬼, 习俗相沿, 而淫祀惑众。”^[9]《厦门志》亦云: “邪怪交作, 石狮无言而爷, 大树无故而立祀, 木偶飘拾, 古柩嘶风, 猜神疑仙, 一唱而和, 酒肉香纸, 男女狂趋。”并且用“岂不谬乎”“尤宜痛为惩治”“尤为可笑”等评语, 旗帜鲜明地予以批判^{[2]517}。

三、道光《厦门志》中的城市记忆

厦门偏居东南一隅, 原为荒无人烟的岛屿, 在宋以前未有记载。因地处交通要道, 屡遭兵火。至康熙十九年(1680), 清总督姚启圣、水师提督万正色、陆路提督杨捷出征金门、厦门, 郑经率厦门守军退守台湾, 同年清廷派总兵镇守厦门。自此厦门得以稳定发展, “人民蕃庶, 土地开辟, 市廛殷阜, 四方货物辐辏”, 在人口繁衍、城市建设、贸易往来等各方面蒸蒸日上,

“巉巉乎可比一大都会”^{[2]13}。《厦门志》用细致地笔调为读者勾勒出一幅海岛城市的图画。

(一) 居民生计

在清政府的统治下,厦门居民的数量稳定增长。人们依靠海洋展开生产活动,农民、工民、商民与海洋都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据《厦门志·关赋略》中“户口”一则记载,乾隆三十四年(1769)《鹭江志》编撰时,厦门有16 100余户人口,而至道光十二年(1832)厦门土著人口共计144 893人(不计僧、尼、道士),其中,男83 229人,女61 664人。人口的增长意味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对各类物资的需求也随之增多。厦门面积狭小,难以进行大面积的农耕。《厦门志·风俗记》称“近山者率种番薯,近海者耕而兼渔,统计渔倍于农”,离山区近者多种植番薯,依海而居者既耕亦渔,整体上渔业远较农耕发达,“田少海多,民以海为田”^{[2]509}。临海的村落划海为界,建立蚝埕、鱼簕、蚶田、蛸淑,养殖各类水产。百姓将海洋作为生计来源,因此十分重视海域的归属。如果出现越界捕捞的情况,会引发争端,甚至是性命之斗。

厦门交通海内外,尤其是南洋诸国,贸易行业相当发达,清时关税收入居福建之首。厦门商民以“贩海为利藪”,航线丰富,对内最北航至辽东锦州,最南到达广东东部,一年可以往来台湾数次;对外可至今天的菲律宾、新加坡、印尼一带。出海贸易最高能够获得数十倍的利润,因此即使风险巨大,亦有数以万计的居民以此为业。海洋贸易的兴盛,使木器、金银器、陶瓷、刺绣等产品都成为热销商品,极大地推动厦门手工业的发展。女性多以纺织为业,因厦门不宜蚕桑,故专事刺绣。技艺高明者“自贍其口尚有赢余”,能够以刺绣养家糊口。冶炼、锻造、木器、制船等手工业者,则以外来移民居多,如《厦门志·风俗记》所述:“厦门土、木、金、银、铜、铁诸工率自外来,船工大盛,安其业者,多移居焉。”^{[2]512}

(二) 城市格局

厦门城坐落在厦门岛中部偏西处,明洪武年间首建,清代多次重建加固。嘉庆时期,厦门城东南西北4门各增设2 000斤重的铁炮,加强防

守。道光时期,厦门城以水师提督衙为中心,方圆600丈,关帝庙、城隍庙、玉屏书院等部分重要场所位于城中。城外建设围绕厦门城,向四周辐射扩展。离城近处有朝天宫、户部衙、鸿山寺、蔡妈街等建筑;远处东南向建有塔头城,北有高崎、东有东屿、西有五通等诸寨,拱卫厦门城。海关渡口则集中在城南门外沿海一带,水师营署主要置于西门、南门外近海处。

厦门岛原本街道狭窄,人口众多,人们居住在简易的棚屋度日,再加上粪土堆积,沟渠不通,整个城市肮脏潮湿。“街市窄狭,民居稠密,架席片薄板蔽日。而又堆积粪土,薰蒸潮湿”^{[2]31}。直到道光十年(1839),厦防同知许原清到任,“疏沟最善,并立石禁止堆积粪土”^{[2]31},在其大力整顿下,这一现象才逐渐消失。随着本土经济的发展,厦门岛上形成了具备不同功能的街市区域,包括出售碗具的碗街、纸制品的纸街、陶瓷的磁街、竹制品的竹仔街等。同时,也出现了菜市、油市、猪市等较为规律的墟集。例如,每日黎明东门外三官宫前有贩卖蔬菜的菜市;每年10月至次年2月,海岸内武庙前定时販售花生油等。

厦门“据十闽之要会,通九译之番邦”,南来北往者甚广。《番市略》中记录了与厦门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多达31个,近及东亚的朝鲜、日本、琉球,远至欧洲的英国、法国、荷兰等。作为海上交通要塞,厦门海关渡口设置清晰,职责分明。例如,岛美渡为海关所在,凡“外洋渡台、南北商船出入”,都需要至岛美渡厦门海关正口请求验证,根据货物类别级重量征税;水仙官渡主要停泊来自金门的渡船,同安、南安船只泊于打铁渡,漳浦、漳州船只泊于太史巷渡等。厦门俨然如《厦门志》收录的孙云鸿《嘉禾海道说》所言,“斯大小帆樯之集凑,远近贸易之都会也”^{[2]16}。

(三) 海岛生活

厦门具有鲜明的亚热带海岛的地理特点:田少海多,不宜种植谷物;气候温暖,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适合花草生长;常有海风呼啸,偶见台风。因此,形成了厦门居民特有的海岛生活方式。在饮食方面,居民多栽种红薯,以杂粮为主食。台运开通以后,米粮主要依赖于台湾的产

出。岛山不生草木, 柴火皆自外来。遇到天气恶劣的时候, 便有“米珠薪桂之虑”。在衣饰穿着上, 居民以布包裹头部抵御海风侵袭, 盛夏亦然。四季温暖, 人们冬天也不穿袜子。城东一带多花园, 菊花四时常有, 所以部分“居民不种五谷, 世以花为业”。岛上房屋建造得低小多门以便通风, 屋顶为平屋顶, 以减轻风力猛烈时对房屋造成的压力。因为屋墙低矮, 容易被人翻墙而入, 所以家家户户在墙角放置有一尺余高的碎瓷碗、碎瓦片等, 以防小偷入室。

(四) 城市性格

厦门自古就是一个岛屿城市, 城海相依, 居民的生存离不开风浪无常的大海。面对复杂多变的海洋环境与丰富的海洋资源, 既需要个人敢于迎风搏浪、不畏艰难, 也需要依靠集体协作、同舟共济, 从而获取足够的生活资料。在此前提下, 厦门形成了一种以冒险拼搏与团结宽容为特质的城市性格。

1. 勇于拼搏的精神。厦门居民无论男女老幼, 从小就能弄潮戏水, 无畏海浪。《厦门志·风俗记》中提到: “十岁童子驾轻舸, 鸣榔下饵, 掀舞波涛中无怖。”^{[2]516}年仅10岁的幼儿可以驾小船捕鱼, 或者敲击船舷发出响声惊动鱼群, 或者撒饵诱鱼, 使之入网, 面对海浪毫不胆怯。这种无所畏惧的冒险精神源自于利润的驱使, “计其获利殆视耕倍也”。这也是厦门商人能够“视汪洋巨浸如衽席”的最大原因。厦门人追逐实利, 勇于冒险, 而在需要保家卫国时, 这种勇猛无畏的精神发挥得更为透彻。《厦门志·列传》里就记载了一批不畏艰险、勇于牺牲的忠烈之士。例如, 奉命死守同安、英勇殉难的叶翼云; 浴血奋战、杀番贼无数, 被困围而战死的张养; 东征南潭、牺牲前阵的彭大猷等。厦门城市性格的重要体现之一就是迎难而上、勇往直前的品质。

2. 团结宽容的品质。大部分厦门居民以海为生, 常年的海上作业离不开彼此之间的信任与配合, 因此形成了一种相互扶持、互利互惠的风气。“岛中风俗, 好义者多, 凡遇义举、公事, 众力易擎”^{[2]514}。在日常生活中, 厦门人好义乐施, 多行普惠民众之举。岛上知名的紫阳书院、玉屏书院的运营经费皆是由官员、乡绅、群众共同筹集而

来。同时, 在官员的倡议下, 通过民间募捐的方式兴建起各类慈善机构, 包括: 建义冢40余处, 来埋葬贫民及在海防战事中牺牲的士兵; 建社仓7处、义仓1处, 作备荒救济之用; 为贫家子女、弃婴设立育婴堂等。当面对外敌的时候, 岛上居民更是能够齐心协力, 守望相助。《厦门志·风俗记》有载: “漳、泉间有所谓强愤者, 厦门四面濒海, 随潮往来, 难于防范。近令各保为图, 十户一灯, 家出人支更, 守望相助, 庶几奸无所容矣。”^{[2]519}岛上居民轮流守夜示警, 以此共同抵御海盗的侵扰。在遇到矛盾冲突时, 厦门民风较漳州、泉州更为温和宽容。“乡村民气亦较漳、泉为驯。间以负气相角, 睚眦小忿, 一叶槟榔, 两家解释; 即宿怨积恨, 亦可杯酒言消”^{[2]519}。村民们通过馈赠槟榔, 即可消除彼此之间的纷争, 甚至积年宿怨也可在酒宴上得到化解。

综上所述, 道光《厦门志》作为一部体例完备的地方志书, 既记录了厦门城市的发展历史, 更是厦门本土文化的一个缩影, 为研究清代厦门乃至整个闽南地区的艺文创作、民风民俗、闽台关系、对外贸易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史料。目前学界仅从海运、兵制、船政等角度关注《厦门志》, 对其文化价值挖掘较少, 这无疑是一种遗憾。当下“海丝”经济、“海丝”文化正成为关注的热点, 在这一契机下, 重新发掘道光《厦门志》的文化价值, 无论是对帮助读者了解闽南文化的过去, 还是提升现有的文化自信与自觉, 都将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 [1] 全台诗编辑小组. 全台诗: 第四册 [M]. 台南: 台湾文学馆, 2004: 332.
- [2] 厦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整理. 厦门志 [M]. 厦门: 鹭江出版社, 1996.
- [3] 余万伦. 周易经解 [M]. 成都: 巴蜀书社, 2019: 69.
- [4] 刘登翰. 闽南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 [J]. 东南学术, 2014 (4): 190-195.
- [5] 薛起凤. 鹭江志 [M]. 厦门: 鹭江出版社, 1998: 18.
- [6] 厦门市图书馆. 厦门古籍序跋汇编 [G]. 厦门: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1：129.

- [7] 吴锡璜. 同安县志 [M].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67: 603.
- [8] 陈支平. 近 500 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 [M].
- [9] 孙尔准, 陈寿祺, 程祖洛. 道光重纂福建通志 [M].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1: 506.

HE Li, CHEN Lin - yu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Languages, Xiam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 *Xiamen zhi*, compiled by Zhou Kai during the Daoguang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is a local chronicle with rich citations and complete styles. It record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rules and regulations, and governance of Xiamen in great detail, and reflects strong local characteristics in such aspects as arts, customs and urban construction.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and analysis of *Xiamen Zhi*, the elements of Southern Fujian culture and urban memory can be extracted, which reveal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Xiamen and helps reader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urban culture of Southern Fujian.

Key words: *Xiamen zhi*; culture of Southern Fujian; city memory

(责任编辑 陈蒙腰)

(上接第 83 页)

LIU Rui

(School of Liberal Art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he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relevant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Lin Geng during his stay in Xiamen (from June 1946 to July 1947) is basically blank in the previous study of Lin Geng. During that period, Lin Geng not only insisted on literary creation and academic research, but also made a collective appearance of his new poetry education achievements in local newspapers. After that, he participated in the initiation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monthly Lighthouse. In addition, the excavation of three new poems in Xiamen local newspapers, the recompilation of the article “On Writing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e discovery of “Talking about Poetry Manuscript” published in Xiamen, provide important first – hand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Lin Geng’ s literary creation and academic thought, and also have certain historical value for the study of Xiamen local literary and academic history.

Key words: Lin Geng; during his stay in Xiamen; textual research historical material; compi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lost works

(责任编辑 张永汀)